

培力视角下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

胡善平

(淮南师范学院法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应用可视化技术对有关精准扶贫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概括总结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趋势。在此基础上依托实务工作的具体经验围绕培力理论、抗逆力理论等多元解释范式从社区培力、个体培力等纬度出发,论述了提升贫困户抗逆力的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认为必须从强化贫困户自身的主体权能、夯实社区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主体赋权、资本项目反哺、程序规范和控制等手段提升贫困群众、贫困地区的潜能和社会连结,以推动扶贫工作的深入研发和持续发展。

关键词:培力视角;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4-0032-07

Study on Approaches to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HU Shanping

(School of Law,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38)

Abstract: The literatures on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arch are analyzed with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trend of academic research is summarized. In this study we discussed the approach and mechanism to improve rural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abilities to fight off disadvantages based on theorie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nd individual empowerment and on experiences from practice. We concluded that poor households' powers and ecosystems must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subject weight, project feedback and program specification, so that potentials and social links of impoverished families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can be promoted.

Keywords: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pproach study

近年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兑现执政党政治承诺,并最终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人民共享发展改革的成果,切实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各级政府加大了精准扶贫开发的力度。尤其是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扶贫史诗。扶贫作为年度热词成为学术界、传媒界关注的重点话语议题。从词源分析的角度来看,精准扶贫属于扶贫的下属概念,是对扶贫工作的升级和完善,可以说其为“扶贫2.0”,目的在于避免传统扶贫工作所存在的不足,真正实现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提升和反贫困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所以常常又和开发建设等词项联系在一起。我国扶贫开发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

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较为突出。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试图通过精准识别、精准施策以提升扶贫工作的效率,实现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的有机整合。所谓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政府试图通过调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资源整合、平台连接等媒介手段从外部植入人力、资金、项目等要素,不断提升贫困户及其所属社区的资源禀赋能力。近年来政府通过项目扶贫、异地开发、社会扶贫等具体措施不断强化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工作理念上的视角缺失,介入工作的简单化、形式化客观上也造就了一些扶贫依

收稿日期:2019-06-27

基金项目:安徽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六个精准”视域下安徽省扶贫工作机制优化与路径整合研究(AHSKQ2018D50)。

作者简介:胡善平(1982—),男,安徽巢湖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应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赖的不良现象,亟待从工作理念、方法等方面进行革新以培育贫困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变外部植入为内源式潜能激发,通过外部连接和内部培育的有机整合,不断改善提升贫困群体栖息地的品质。

本研究认为精准扶贫实务工作应突出内源性优势资源的开发,以及与外部优势资源的有效链接以提升贫困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和抗逆力系统。从个体方面来看,突出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渠道和自觉性,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并从扶智、扶志维度出发开展具体工作。从社会方面来看,突出社区整体发展与社区策划,力图从微观、中观、宏观立体方面构建贫困户的培力体系和介入的路径与框架。在总结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对实务工作经验的总结梳理,概括分析精准扶贫工作培力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和工作范式,以不断验证检验培力理论的解释能力,并不断丰富完善培力体系构建的具体策略。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主要从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对策研究、精准识别、产业开发等方面展开相应研究^[1-4]。通过语义路径及关联分析发现,现有研究文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相应论述。

1. 精准扶贫的意义和价值分析。部分学者从政治统治、政党权威及合法性、公民权以及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了精准扶贫对于反贫困的意义和价值^[5]。学者汪三贵、郭子豪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全球扶贫工作的深入细化^[6]。部分学者运用社会分层、相对剥夺以及人力资源储备等视角分析了精准扶贫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7-8]。部分学者沿用马克思、斯科特以及吉登斯等学者的观点,分析了精准扶贫的正义论价值,体现了很强的价值介入和人文关怀性^[9]。学者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掌握贫困人口的特征、分析其致贫原因,从而更加合理地分配和利用扶贫资源以及监测扶贫效果,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达成^[10]。

2. 精准扶贫的具体实务工作总结。部分学者在地方性实务工作的基础上,梳理了一些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扶贫工作典型模式,强调必须从资金、金融、财政和人员培训等方面构建全社会的扶贫社会支持系统。总结出项目开发型、劳动力转移培训、易地扶贫、革命老区和信贷扶贫等工作模式并建立了相应的定性考评机制^[11]。但相关研究理论分析不

够深入,缺乏通识性模式的梳理,具体指标存在难以量化,测量缺乏信度和效度方面的确切性保障。政策、项目介入的碎片化、条块化分割等问题比较突出,限制了介入效果的有效匹配。学者陈升等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梳理总结了项目制扶贫、产业扶贫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流程管理的理论视角提出了强化程序公正的必要性^[12];学者葛志军、邢成举通过实务总结分析了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各个具体领域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丰富完善的建议^[1]。

3. 精准扶贫体制路径构建研究。扶贫行为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突出了自上而下行政介入的属性,体系开展涉及动力源开发、项目设计、行为介入及策略选择、绩效考核等有机构成要素。现有研究大多根据既定资源束缚,力图通过系统的优化组合以实现体制创新。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介入主体的声音和利益表达比较强烈,扶贫对象的主观感受和评判没有很好地加以体现,扶贫对象失语现象比较突出;强调从外部植入社会支持,忽视了主体自身能力的构建以及其所处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改良^[6,13]。

这些研究对于深化扶贫工作力度、提升工作针对性、拓展研究的领域开拓研究的思路和视角都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但普遍存在着过于强调扶贫对象外在环境资源禀赋缺失和生态环境脆弱等元素,预设贫困人群是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群体,而他们又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这种需要,从而主观认定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外在去进行资源的补充,注重输血却忽视造血功能的构建。目前扶贫实践领域中强调的“十大工程”“五个一批”等项目无不含有这样的理论预判,往往忽视了贫困户自身优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基于培力理论模型中内涵的生态系统、抗逆力、优势视角等相关概念、分析范式,试图从内源性培力介入的角度入手构建贫困对象自身的可行能力体系,实现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和丰富,提供其能力提升和运作发展的具体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实务工作积淀

(一) 理论基础

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社会学研究在本质上不能以单纯地追求宏观理论叙述为目标,而是要以发展一种既能将理论与实践有机整合,又能进行适度理论拔高以构建中层理论为目标。一方面,理论没有偏离实际,能够在实践中加以具体的验证和检验,

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程度的拔高和提升,能够进行抽象论述和分析。本研究所依托的“培力”理论及其所包含的抗逆力视角、生态系统视角等正好具有这样的特质。一方面能够适应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并进行必要的指导,另一方面又能推动本土化扶贫理论、反贫困理论的生成和建构。“培力”(empowerment),常常被国内学者翻译为“增能”“增权”“赋权”,指的是每个人、每个社会主体自身都拥有很大的力量,包括能力、动力和权力三个方面的内容。若这些力量得不到发挥,主体就会感到“无力”、“无助”和“无望”,因而就会产生困扰和问题。内源性的缺失和不足是“培力”理论对主体特性的基本假设。培力的落脚点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社区,涉及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等方面的制度匹配和有机衔接等一系列问题^[14]。培力理论认为个人需求不足和问题的出现是环境对个人的压迫造成的,介入工作应该将重点放在增加服务对象的权能方面。其包含的基本设定有:个人的无力感是由于环境的压迫而产生的,但这种压迫和障碍是可以改变的;缺乏权能并不是真的缺少权能,而是环境压迫使得个人的权能不能发挥;受助者的权能不是外界给予的,而是要不断被激发和培育的。这一分析范式又具体通过生态系统理论、抗逆力理论加以具体的呈现。

生活空间是一个多维的区域,功能代表了人们在这多维领域内显性的生活状态;能力是人们为了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而应当享有的权利、机会和自由,是获得有价值生活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包含了功能和能力两方面的内容。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作为人类发展过程构建起来的生存空间是成长中的个人与其环境间长期交流的结果,而不是单一的个人特质因素的产物,个体需要有取得资源的机会,否则无法建立自己的生存空间。人生来就有与环境、其他关系人互动的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生活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并在环境中不断被建构。在改变的过程中要时刻重视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要不断提升和维护其可行的能力体系和工作框架。

抗逆力理论是在综合优势视角和增权赋能视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全新理论,指个人在面对生活逆境时,能够理性地作出正向的、建设性的选择并具有开展策略行动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在用“常规方式”的亲社会行为替代“非常规方式”的反社会行为的过程中,不断生成具体的策略集合。从构成要素方面看,抗逆力由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内在优势因素

(I am)以及效能因素(I can)三个方面构成,彼此形成自身闭合循环的成长系统。其中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包括拥有正向的联结关系、坚定清晰的规范、关怀支持的环境、积极合理的期望、有意义的参与机会等;内在优势因素(I am):包括完美的个人形象感、积极乐观感;效能因素(I can):包括人际技巧、解决问题能力、情绪管理及目标订定等(图1)。



图1 抗逆力环构成要素及生成机制图

播种、发芽、培育、自我发展和组织化以及外部土壤条件等等是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恰好能够从历时性角度总结概括培力机制的基本要素。这些概念和理论范式可以作为必要的分析工具用于因应精准扶贫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现实需求。通过基层调查深入开展需求分析以明确需求结构并进行紧迫性排序,凝练潜在胚芽和发展的具体方向。社区资源的整合;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反向介入能够培育和推动贫困地区社会联结和机会提供,以策应抗逆力环功能的构建和发挥。研究就是要在这样的理论策划下,探寻和总结扶贫工作实务的基本逻辑和运行实际,并进行必要的模式总结以期实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保持社会流动通道的畅通,避免社会刚性和固化,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进一步将代际公平、地区公平等抽象伦理、价值追求变成实际的政策、措施并予以具体实施,并通过结果考核、过程考核予以评判。以下研究依托安徽省精准扶贫工作村级项目、户级项目执行情况的统计分析,研习精准扶贫培力机制构建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存在阻隔等方面问题并提出相应因应措施以期推动培力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丰富。

从扶贫实务工作的实际来看,对外部支持因素的关注比较突出,但贫困户内在优势因素的挖掘却有待进一步的强化。为此,今后农村扶贫工作必须在原有体系框架的基础上,突出内源性因素的培育开发,积极构建具体的提志工作路径。在理论上于

可行理论具有高度的切合性和一致性。可行能力方法强调个体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认为只有保障公平的机会和积极的自由才能确保社会基本产品转化为对个体有价值的功能。^[5,15-16]学者杨帆、章晓懿基于对可行能力的分析理解认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必须以发展个体和家庭的能力作为导向;必须注重个体和地区的差异性,做到因地因户施策;必须要建立科学的扶贫工作体系和专业的扶贫工作者队伍以改善贫困对象所属栖息地的品质。阿马蒂亚·森在发展抗逆力理论方法的过程中,尤其强调该理论规避了由物质资源分析路径和效用分析路径所导致的拜物主义和享乐主义陷阱,突出制度约束和行为反馈之间的互动嵌构关系。这在理论上高度切合吉登斯等人的学术观点,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是同时存在的,两者不可分离地在结构化的过程中交织在一起。正如学者虞崇胜、余扬所强调的那样精准扶贫以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为宗旨,这是扶贫理论的重大进展,也是精准扶贫理论的逻辑延伸,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

本研究基于扶贫实务工作的数据分析和实务总结,力求构建具有中层意义的分析范式和经验概括,以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有效兑现,提升贫困户持久发展的能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在实现这一人类壮举的过程中,政治、道义性原则的宣讲固然重要,但其实际推进必须充分研判经济成本和效益考核,必须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物质财富积累的现实性,必须准确研判扶贫工作中具体环节中存在诸多现实性阻隔。构建贫困户发展的可行能力支持系统,并从宏观、微观等多维视角出发整合构建多元主体力量匹配介入的综合考评体系,将政治宣讲和经济效益考量有机结合,基于现实性资源、物质禀赋运用市场、行政等手段推动扶贫工作的有效推进,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弱势群体增能系统,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序运行。

(二)培力体系构建的实务操作——基于安徽省的总结分析

为有效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可行能力,2013年以来,国家从战略层面将精准扶贫上升到国家高度。各地为响应中央决策,纷纷制定相应配套措施,围绕项目开发、人员配备、资金投入等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实务工作。安徽省作为贫困人口绝对数量较多、贫困人口比例较高的省份,为全面落实中央有关精准扶贫工作的战略部署,结合本省实际

先后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讲话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意见》《关于印发安徽省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同志脱贫攻坚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安徽省脱贫攻坚第三方监测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全流程的制度设计和六个精准的考评设计,规定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稳定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贫困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力争达到5万元以上;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从这些政策背后所包含的基本设定来看,主要特色在于强调分级负责、政府主导、内生动力激发、资源补缺等以完善充实扶贫对象的可行能力,赠权赋能的性质体现得非常鲜明。从赠权赋能理论本源意义的角度来看,涉及社区赋权和家庭主体赋权、个体赋权三个层次的具体内容,强调内在与外在资源的整合功能发挥。传统意义上扶贫工作常用的理论分析范式主要有结构分析和文化分析两种视角,结构分析认为贫困是外在支持不足的结果,只要解决了制度和政策因素,贫困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文化解释则认为贫困是个人内在条件欠缺所致,扶贫首先要“扶智”,只要发挥了扶贫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贫困也会自然消失。因而,结构与文化视角下的扶贫实践,共同的倾向是从问题/需求角度出发,采取“缺乏视角”的扶贫观,认为贫困是外在条件缺乏和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预设了贫困人群是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群体,而他又无法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这种需要,而要改变这种状况,要么对扶贫制度本身进行完善,要么提高贫困群体的个人素质,却不考虑发掘社区、个人自身存在的优势,发挥社区及居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培力理论所包含的优势视角和赋权视角则极为重视社区能力的培育,主张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社区发展的主要手段。以培力理论所突出的系统观、整合观为指导能够很好地策应致贫的个体、微观、中观以及系统原因,而这恰恰是精准扶贫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扶贫工作的最大亮点。

为实现上文所提到的到2020年全省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有序退出,如期脱贫的攻坚目标。安徽省一方面构建了任务推进的责信体系、制度框架和评判依据;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县级、镇级、村

级、户级四级培力体系并通过定期绩效考核予以推进。从精准扶贫实务工作的现实情况来看,主要着力点又集中于村级、户级两个层面,其体系的评价指标构建相对比较完善、科学。考虑到普惠性扶贫措施的共享性、无差异性,不能凸显培力构建的实际绩效,下文主要呈现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以来村级、户级两个层级特惠性培力措施的主要构成和实施策略如表1、表2所示,梳理分析培力体系构建的实际、存在问题以期更好地基于需求本位推动培力体系的构建。文中所提普惠性措施特指所有农村居民均可享受的旨在降低贫困风险的保障性措施如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等;特惠性政策特指只有贫困村、贫困户才能享受的关怀介入举措(表1)。

表1 精准扶贫村级项目建设一览表(特惠性)

一级项目类型	二级项目类型	二级项目操作说明
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建设	区域布局
	桥涵建设	公共产品投资
	农村电网改造	公共产品投资
	水利建设	公共产品投资
	信息化建设	信息公平和畅通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卫生、休闲
公共服务项目	医疗卫生建设	
	文化建设	
	教育建设	
	体育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项目	其他公共服务项目	
	光伏扶贫	贫困村村级站
	种植业	特色种植、市场连接
	养殖业	特色养殖、市场连接
	加工业	国内生产的梯度化及分散化
	乡村旅游	城市反哺乡村
	资产收益	
	扶贫贷款	货币植入、资本反哺
其他帮扶项目	电商扶贫	
	其他产业发展项目	
其他帮扶项目	帮扶单位帮扶项目	
	其他社会帮扶项目	

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追求,作为近年来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主要动力源,政府行政体系强调通过公权力的介入,采取加大财政投入的方式推进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建设和普及。采取这些措施一方面有利于强化政府的政治功能、便于推进其合法性建设。通过反思性监控、组织化、制度化等方式推动国家形态的建设。另一方面基于公共投资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和乘数效应,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投资总额以为此投资性消费所

具有的综合功能。从抗逆力的角度来看,产业发展扶贫所采取的诸多措施有利于实现图1所强调的提供机会与参与、教授生活技能、增加社会联结的目标,以实现社区赋能和赠权。国家扶贫工作有关贫困村出列的指标体系就是要在这一层面上回应这一问题。通过这些措施的有序推进目的在于消除历史上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区隔带来的各种弊病,以项目扶贫、社会扶贫等方式夯实贫困地区、贫困家庭以及贫困个体的内驱动力,积极构建立体化的扶贫体系(表2)。

表2 精准扶贫户项目建设一览表(特惠性)

一级项目类型	二级项目类型	二级项目操作说明
基础设施建设	安全饮水	区域布局
	危房改造	
	易地搬迁	
	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资助类项目	教育资助	雨露计划、春雷计划、减免学费等
	社会帮扶资助	低保、五保等
	其他公共服务项目	商贸流通等
产业发展项目	光伏扶贫	户级站
	种植业	产业发展,大户带动和个人发展
	养殖业	产业发展,大户带动和个人发展
	加工业	
	乡村旅游	农家乐等休闲娱乐项目
	资产收益	
其他帮扶项目	扶贫贷款	小额贷款
	电商扶贫	
	其他产业发展项目	土地流转等
	健康脱贫	大病救助、补充性商业保险
	就业脱贫	技能培训、劳务输出
其他帮扶项目	生态保护	退耕还林、塌陷区青苗补偿等
	其他项目	

户级精准扶贫措施则从更加微观和具体的层面回应了培力体系构建的问题。不仅能够提供关怀和支持,还能够构建服务对象的期望体系和能力体系。通过普惠性、特惠性帮扶措施的有机整合,能够实现短期时间范围内的“两不愁、三保障”,还能兼顾长期时效范围内能力体系的构建和维护,能够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潜能陪护等方面构建贫困户的发展可能,以消除服务主体“无力”“无助”和“无望”等主观感受生成的可能。

精准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要实现目标设定之“六个精准”必然牵涉到多部门之间的联动和信息共享,必须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才能进行综合性研判。数据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可能性。从现在家庭收入支出

测算的指标体系来看,涉及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以及相关支出测算。要做到精准测算内在性必然的要求部门破除数据壁垒,通过扶贫工作专属机构的构建实现互通,这对于基层管理的科学化、精密化必将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安徽省扶贫工作为实现精准化,先后设计《脱贫攻坚县级年末核查表》《脱贫攻坚贫困村出列年末核查表》《脱贫攻坚脱贫户年末核查表》《安徽省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调查表》等精密化表格,通过构建精准扶贫数据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录入、修改追踪、数据分析、过程管理和监督,并辅之以银行存款、就医记录、住房、教育、健康等多方面信息,以确保认定、帮扶、绩效考核的精准化。将实体工作开展与程序完备性作为绩效评估的主要依据加以整合,实现了扶贫工作的网络化、可溯化。这从根本上有利于实现微观系统、中观系统以及宏观系统培力机制的完善和构建。

2014年以来安徽省各级政府通过外联内培,不断投入技术、资金、教育、培训等优质资源,不断搭建资源整合平台提升农村社区的內源性发展动能;通过项目反哺、人才反哺、产业反哺等不断提升了农村地区优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通过政策衔接匹配,不断营造优良的栖息地环境,提升丰富农村地区的资源吸储能力,积极构建一体化的城乡发展格局。经过不懈努力,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迈出坚实步伐,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增加、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表1、表2所示安徽省精准扶贫实践工作措施指向主要关注的是外部联结性质的资源投入,內源性对象自身的潜在优势,社区栖息地自身的资源禀赋挖掘开发略显不足,极大地限制了贫困户主体可行能力和可行空间的构建。后续工作还需从扶智、扶志的角度出发,充分挖掘、激发贫困户自身的內源优势和潜能,以培育其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组织体系。这不仅是对现实工作经验反思的必然结论也是精准扶贫工作逻辑演化的必然结果。

四、进一步完善贫困户培力体系的路径与机制

为实现精准扶贫工作的精密化、科学化,在实务经验的基础上,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开展工作,以构建完善、科学、可行的贫困户培力系统。即通过网络联动改变精准扶贫工作主体系统的科层制陷阱;內联外通培育精准扶贫工作服务的支持体

系;利他使群激活精准扶贫工作的服务对象生态系统;赋权增能巩固精准扶贫服务的能力体系。

(一)潜能挖掘、需求回应,突出主体赋权及其运行机制的构建

理念上必须理清政府、个人、社会等主体彼此之间的责任关系。现存数据、信息鸿沟经由老龄化、弱势化不断得以强化,逆向叠加现象比较严重。因病、因残与缺劳力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农村社区的空心化、荒芜化消解了社区培力、个体培力措施的实效性。主体人力资源的缺失、自身素质的不足是制约农业发展、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因素。职业农民的培养、培训以及新农人的引入是推动农村技术更新、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途径。城市中产阶层对优质农业产品资源的需求,造就了产业投资的巨大市场平台,为城市实体产业的介入创设了必要的前提。城市巨大的货币筛选机制以及异质性社会的竞争压力,促使部分城市白领退出城市场域,辅之以政府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推介,为城市居民、外出农民工反向移动回迁农村社区创设了契机^[7]。从身体规制的角度来看,应当强化公共医疗投入,发挥医疗兜底功能,进一步夯实医疗救助和残疾康复治疗体系。从主体人力资源培育的角度采取必要措施吸纳优质人才融入乡村社会。以需求有效策应作为出发点,推动扶贫供给策略的有效转变提升供给策略。通过系统整合和主体联接营造全社会携手共同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以减少单一行政主体资源投入的弊端和不足。从內源性视角出发去分析社会组织介入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意图愿景以及现实运作,通过专业指导和能力培训提升社会组织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能力。发挥专业社会组织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精准扶贫的优势和潜能,同时不断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体系的构建。脱贫的根本落脚点在于自身能力的发展,只有具备了基本的可行能力才能稳定、可持续地进行各种功能性活动,包括创造物质财富。

强化主体培育和需求的有效回应,突出能力培养机制的构建,推动优势要素向农村地区的回流,强化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培育项目扶贫的承接主体和运行主体,积极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强化“三变”改革的政策支持,推进农民的经济组织化、市场组织化、管理组织化,有效整合人才反哺与属地培养的关联关系,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二)內联外通、关联匹配,强化资本、项目反哺的有机整合

从村级、户级扶贫措施的构成来看、各级行政

体系为推进扶贫工作投入的力量不能不说十分全面。但项目的简单叠加往往会消解贫困户的主体赠权意愿,负向引导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客观存在,使得非贫困户往往会质疑扶贫工作的合法性。多层次措施的整合点应该以发展扶贫主体自身能力为真正落脚点,具体包含社区能力、个体自身能力等方面的建设。项目、资本反哺必须在充分研判主体需求类型和结构的基础上,以效益考评为根本评判依据,对项目、资金使用进行跟踪考核。不能过于突出行政规制力而忽视市场经济力的基本规律,要做好产业发展项目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之间的衔接匹配。

基于缺失性假设下的扶贫开发,通常强调政策性反补和输血式扶贫。政策制定往往基于贫困户缺失性内容采取相应措施而忽视了措施执行的可行性。贫困户致贫原因的依据主要有因病、因残、缺劳力、缺技术、缺土地、缺资源、因学、因灾以及整体性区位环境不利的因素。因而行政主体通常会采取产业脱贫工程、就业脱贫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生态保护脱贫工程、智力扶贫工程、社保兜底脱贫工程、健康脱贫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工程、金融扶贫工程、社会扶贫工程等措施予以因应,但往往缺乏长期性制度保障从而导致难以发挥其综合效益。资本反哺主要依据市场化的原则并通过产业推进的方式整合农村的存量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这种方式对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因残致贫家庭托底帮扶的效果有限。通过资本整合农村社区现有存量资源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以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特色化发展,提升土地、劳力等资源收益率。消除碎片化扶贫工作机制存续的各种负面影响,理清扶贫工作中科层行政、国家治理、市场运作以及扶贫对象等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行为竞合,以综合提升贫困对象的培力体系并改善培力结构。

(三)网络联动、技术介入,运用数据平台以实现实体业务、程序推进的可控性

正如上文所述,为实现精准扶贫工作的“六个精准”,必须严控数据录入、修改等环节的过程性监管。必须将不同部门、主体各自开展推进的扶贫项目通过统一口径和平台加以汇总,适时跟进项目具体落实情况。为防止扶贫工作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可能带来的弊病,必须将民政、扶贫等专门机构掌握的数据加以整合。依托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实现数据共享以便于综合研判和分析,从而为综合评判和业绩考核提供相应依据。开展社会组织资源分

析和能力培训,以设定项目的方式,围绕动力机制、整合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建设推动平台建设。通过需求调查、数据分析、方法介入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和政策宣讲,通过平台搭建、技术联合和数据集成推进社会组织能力体系建设。围绕基本条件、自身建设、社会服务以及工作绩效等指标体系强化社会组织能力体系建设,以便更好地承接精准扶贫工作^[18]。

(四)利他使群,功能衔接,多元主体介入策略的有效黏合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能够有效进行资源整合的主体通常有政府、市场、自组织、个人四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一种主体在资源配置中都各有优缺点。为此,精准扶贫工作应当构建有效整合机制,发挥各个主体的长处以实现功能衔接,不断推进工作的整合体系。通过行政性、经济性、互惠性、组织性力量不断改善贫困对象的资源禀赋和储备状况,提升其实践能力和资本联结状态。在实务操作层面要注重分析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匹配,发挥各个主体的潜在优势不断满足社会成多多元化的需求。政府通过行政性规制引导市场主体和公民自组织群体的供给行为并不断调整存量资源的使用可及性,不断优化增量资源的布局 and 配置;市场主体通过货币区隔提供差异化的资源供给;公民自组织主体通过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来影响政府主体的政策导向,通过社会建设来平衡政府、市场主体的行为驱动,以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

价值评判奠基于资源分配的组合关系,合法性权威、支配性权威以及符号性权威往往都以资源的分配状态为基础,资源和规则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制度丛和行为方式。汲取性财政的索取性会造成干群矛盾,惠及性财政如若程序缺失同样会造成干群关系、农户关系之间紧张和冲突,这里除去经济人的理性考量之外,还包含着农民对于公平正义等等的伦理诉求。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制的载体,其运行机制的背后也涵盖着一定性质的经济元素,农民对于扶贫工作的道义评判其实是一种非常经济的监督方法,繁琐的程序监督往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济匮乏时代,诉诸道义监督是合理的,但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程序设计的相应支出是社会完全能够承受的,通过程序的规范化设计和运行,能够有效训练社会居民的民主思维和实践能力,

申序列的梳理。正如蒋绍愚先生所言“考释近代汉语的口语词,如果是为了阅读或编纂词典,那么弄清某词语是什么意思就可以,但是,如果要对这个词语了解得深一些,就还需要推求语源。推求语源包括两个方面:(a)弄清某个词语的历史来

源;(b)弄清某个词语的‘得名之由’(或者叫‘内部形式’)”^{[6]294}。当然,这里所说的推求语源指的是第二种,即阐释词语的构词理据。方俗词的考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注释:

① 引自《汉语大词典》前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

参考文献:

- [1]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2] 汪维辉.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兼与刁晏斌先生商榷[J].吉林大学学报,2017(1):158.
- [3] 王国维.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C].王国维戏曲论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 [4] 许巧云.《元刊杂剧三十种》词语研究[M].民族出版社,2018.
- [5] 许金榜.元杂剧的语言风格[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4):61.
- [6]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上接第38页)

从而有利于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化进程。

总而言之,由于贫困户的认定标准会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而具有变动性,现行标准下通过外部支援和资本链接虽然能够短时间内改变贫困户的生活境遇,但根本落脚点却在于使其具有进一步

自我发展、自我赠权的意识和能力。因而构建贫困户“助人自助”的培力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价值判断应当作为未来系列政策出台的基本依据和首要原则。

参考文献:

- [1] 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 [2] 莫光辉.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开发模式的内生变革与治理突破[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2):73-78.
- [3] 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 [4] 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 [5] 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2015(2):56-59.
- [6] 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 [7] 陈升,潘虹,陆静.精准扶贫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东中西部的案例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6(9):88-93.
- [8] 庄天慧,陈光燕,蓝红星.精准扶贫主体行为逻辑与作用机制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5(6):138-146.
- [9] 胡振光,向德平.参与式治理视角下产业扶贫的发展瓶颈及完善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4(4):99-107.
- [10] 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 [11] 杨帆,章晓懿.可行能力方法视阈下的精准扶贫:国际实践及对本土政策的启示[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57-163.
- [12] 陈升,刘泽.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以精准扶贫为例[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5.
- [13] 黄承伟,覃志敏.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1):130-136.
- [14] 李鹏,叶兴建.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2):157-163.
- [15] 李国治,朱晓芸.农村精准扶贫的问题与对策[J].黑河学刊,2016(1):135-137.
- [16] 虞崇胜,余扬.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J].行政论坛,2016(1):22-25.
- [17] 李博.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J].北京社会科学,2016(3):106-112.
- [18] 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J].社会学研究,2016(6):119-143.